

民族主義在國民黨 歷史上的角色

• 張玉法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深度，存在於每個中國人的心底，或更表顯於外，訴諸於言論和行動。近代中國史上的所作所為，許多是受着民族主義的左右。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幾度分裂，以及所確立的治國的理想和意識形態，都表現出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一 民族主義轉向對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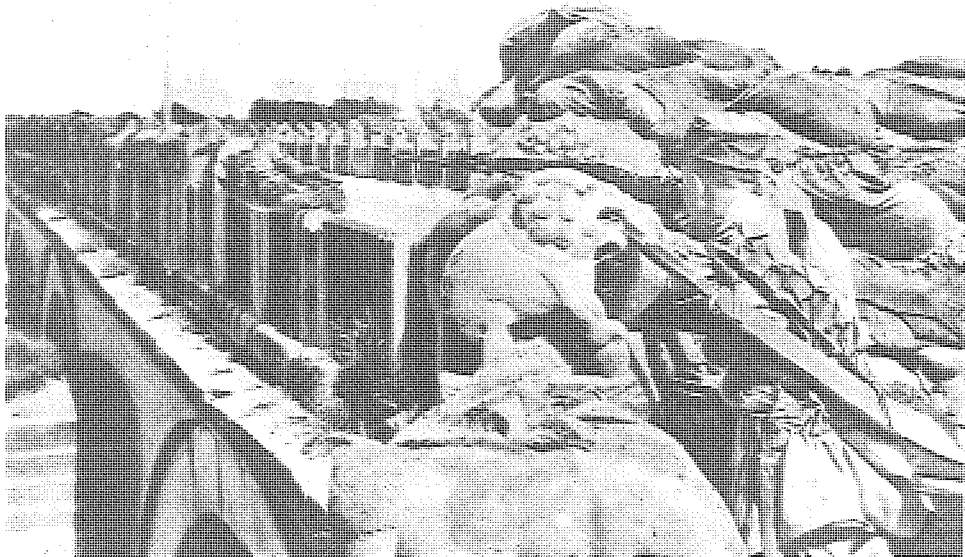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的時代過去以後，傳統的民族主義消失，注意力集中在對外上。繼承孫中山志業的蔣介石，對民族主義的看法與孫中山一致，他說^①：

民族主義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要求我們中華民族獨立，享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同時並主張世界各民族獨立，一齊享得自由平等的幸福。換句話說，就是一面不許外國帝國主義壓制中國，同時我們中國也不壓制旁的民族或國家。

其他的國民黨人努力的方向也是如此。戴傳賢則有但求國家富強，不論民族顏面的傾向。他認為雖然共和制度與經濟發展觀念源自外國，卻為造成一個強盛的中國所必需；一個國家或民族若無法開創新局就足致敗亡，吾人無暇去頌揚中國本土之政治抑文化傳統，一旦國勢得振，以上的問題將自會有其解決之道。戴傳賢似乎並不關心文化平等問題^②，與孫中山「迎頭趕上」、「學習歐美的長處」等主張一致。

戴傳賢借用共和制度和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富強的工具顯然是選擇性的，他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卻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共雖然反抗帝國主義，但所主張的馬克斯主義卻要消除民族感情，沒有資格自稱為民族主義者^③。汪兆銘也認為：「國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聯合反帝國主義，……提出階級鬥爭，使社會間自相殘殺，與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④戴、汪是從理論上說的，

日本侵華，使國家存亡成為所有黨派共同關心主題，民族主義變成溝通、結盟和統合的基調。圖為1937年29軍守衛盧溝橋。



從中共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共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和其他方面，都充分利用民族感情。

二 國、共絕交的民族主義因素

五四運動以後，民族主義的情緒日益高漲，反對基督教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抵制英日貨運動，在各地此伏彼起。1925年的五卅慘案、漢口慘案和沙基慘案，尤激起全國性的憤慨。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所到之處，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據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了解，「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乃承接五卅慘案、漢口慘案與沙基慘案所激起的潮流」^⑤。在北伐途中，蘇俄欲支持中共，改變國民黨的黨統，國民黨毅然清黨，並與蘇俄絕交。絕交的理由，基本上是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對俄絕交宣傳大綱中說^⑥：

北伐途中，蘇俄欲支持中共，改變國民黨的黨統，國民黨毅然清黨，並與蘇俄絕交。絕交的理由，基本上是民族主義的。

自從我們發現蘇俄的陰謀——發現蘇俄由第一步煽惑弱小民族、進而第二步利用弱小民族、更進而第三步壓迫弱小民族的陰謀以後，我們早已料到中俄必有絕交之一日，現在果然應驗了。

此宣傳大綱進一步舉證並推論說^⑦：

赤俄煽動蒙古脫離中國，蒙古的管理權落在蘇俄之手以後，又去煽動蒙古駐兵新疆，以遂其并新疆之野心。這是和白色帝國主義者，利用國內軍閥互相戰爭，以遂其侵略的陰謀，是毫無二致的。

為維護黨統，國民黨不惜拒絕俄援，但在民族主義的風潮下，國民黨仍完成了全國統一的工作。

三 治國的民族主義原則

自北伐時期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努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終於從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蔣介石的治國觀念，可以說是堅持着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原則^⑧。

1931年以後的抗日風潮，以及1937年以後的全國抗日運動，更是受民族主義主導的。抗戰時期，據鄒韜奮的觀察：「與抗戰最有重要關係的事情，莫過於民族統一陣線的形成，即全國精誠團結起來，一致在政府的抗戰國策和領袖的堅強領導之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⑨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是以民族主義為基點。當時國內各黨派鬥爭激烈，能夠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是訴諸於民族大義。1937年7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當這國難極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接着發表關於中共宣言的談話：「吾人革命所爭取者不在個人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在同一原則下，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救國會派、職教派、村治派、教授派等，也都接受國民政府的延攬，參加國防會議及後來的國民參政會，為抗戰救國而共同努力。鄒韜奮說：「本來政黨是代表社會中某些階層的利益，但是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是全國各階層的共同的要求，在這一點上有着全國一致的共同利害，所以造成全國各階層的團結，因此也就造成抗日各黨派的團結。」^⑩其後日軍席捲沿海及鄰近沿海的各省，由於日軍只能控制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留下了廣大的鄉野地區，中共發揮游擊戰的專長，在敵後建立了廣大的根據地。其後國共雙方為了爭奪地盤，再度決裂。但當時的中國人，無論追隨中國國民黨，還是追隨中國共產黨，雖然對抗戰的方式和權力的分配等有意見，抗日的情緒都很高。雖然有些軍人為保存實力而投降，有些文人受不了威迫利誘而做了日人的傀儡，真正的漢奸還是不多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持反蘇的民族主義，中共持反美的民族主義。自俄國革命以後，中國人對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了解不深，對歐美白色帝國主義的了解已多：反蘇的民族主義終不敵反美的民族主義，而造成國民黨的潰敗。

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是以民族主義為基點。當時國內各黨派鬥爭激烈，能夠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是訴諸於民族大義。

自俄國革命以後，中國人對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了解不深，對歐美白色帝國主義的了解已多，造成國民黨的潰敗。

四 文化民族主義的展開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在清末原較激進，到民國建立以後，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漸濃。有一派人的文化民族主義是開展型，可以戴傳賢為代表，他對中西文化所抱持的態度是「勿迷信新與舊，須辨別是和非」，認為「絕端的趨新，與絕端的守舊，都是同一的不健全，同一的危險」，他主張「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來，把世界文化從頭趕上去」^⑪。另一方面，負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陳立夫，1930年為對抗左翼作家的「普羅文學」而提倡的「民族主義文藝」，則比較保

最能代表國民黨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是1935年國民黨透過十教授所發表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這是為矯正「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復古運動，和陳序經等人激進的西化論而發的。

守。參與民族文藝運動的人認為「文藝底最高使命，是發揮它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文藝活動應以喚起民族意識為中心」；他們認為：「有了民族主義文藝的作品，然後那分裂中國人為幾個階級、鼓吹着階級鬥爭的普羅文學，引導中國人到頹唐衰廢的路上去的浪漫派文藝，和迴戀過去、染有封建色彩的古典派的文藝，自然為之掃蕩一空」^⑫。最能代表國民黨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是1935年1月10日國民黨透過十教授所發表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這是為矯正「中國文化建設協會」(1934年3月成立)的復古運動，和陳序經等人激進的西化論而發的。所謂中國本位是指此時此地的需要，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要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對歐美文化，吸收之標準應取決於現代中國的需要，而不應全盤接受^⑬。

五 民族國際的理想

共產主義雖是一種國際主義，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它也是帝國主義，因為它是外來的，並帶有強制性。1917年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對中國國民黨及其治理下的人群來說，有一段時間，赤色帝國主義可怕的程度不亞於白色帝國主義。在許多反共、反帝的國民黨人看來，一次大戰後出現的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大同盟；而蘇俄的第三國際，以及所領導下的赤色農民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是利用民族運動進行赤化的工具。戴傳賢認為：弱小民族國家既不能向國際聯盟哀求生路，也無法向第三國際謀求妥協，只有結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爭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只要中國民族振興起來，中國必扶持弱小民族爭取自由平等。民族國際的理想，孫中山先生在清末民初推動革命期間一直在追求，戴傳賢是負責執行者之一。孫中山清末在日本東京組織「東亞民族青年協會」，1913年與桂太郎發起「中日同盟會」，章炳麟等於1907年發起組織的「東亞亡國同盟會」與「亞洲和親會」等，都是從民族國際的理念出發。此一理念原來只看不說，到孫中山死後，戴傳賢才於1925年7月和9月逐漸將之公開^⑭。

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抗的過程中，有些政學界人士企圖以促進國際合作的方式，使中國對外國有益，也使外國對中國有益，戴傳賢所宣揚的「民族國際」即表達了這樣的理念。不管個別的看法如何，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等組織的出現，即是這種國際主義的實現。關於中國與此類國際組織的關係，以及在此類國際組織的影響下所做的一些事情，本文不擬探討。此處僅舉兩例，說明國人在調和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上所做的努力。

孫中山借用外資以發展中國實業的方案，自1921年以後即為世人所知。他認為如果等中國有資本才發展實業太迂緩，主張借外資來開發交通、開闢商港、發展礦業和農業，以及建立冶鐵製鋼廠和土敏土工廠等。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據孫自述：「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且以助各國戰後工人問題之解決。無如各國人民久苦戰爭，朝聞和議，夕則懈志，立欲復戰前原狀，不獨戰地兵員陸續解散，而後路工廠亦同時休息。」孫感慨地說：「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故雖有三數明達政治家欲贊成吾之計劃，亦無從保留其戰時之工業，以為

中國效勞。^⑮孫中山借外資以發展實業的計劃雖無成，其後國民黨執政期間，則借外債從事建設，惟規模未若實業計劃大。

孫中山發表「實業計劃」主張國際合作開發中國經濟時，蔣廷黈正以留美學生代表的身份參預華盛頓會議。蔣對孫的計劃很有興趣，他於1923年10月在北京《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西方激進主義與中國外交關係〉，警告國人不可再有「亞洲王朝」這種閉關時期的愚昧想法，並婉轉指正隱藏在「反帝」聲浪中激情而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他建議對藏、新、蒙和東北要有一套「開明的殖民政策」。蔣擺脫了十九世紀以來社會主義者對帝國主義的道德批判，而純以經濟開發和國際間相互依賴來衡量殖民主義。因此，他將明清以來的中國，等同於英國、俄國和日本，認為都是要將其力量(資本、技術和人力)投入藏、新、蒙和東北，以利用其資源，提昇彼此的經濟生活品質。1930年11月，他在翻譯《族國主義論叢》時，建議中國不可有自大自尊的傾向，認為中國若欲自強，必須有國際的同情與協助：中國必須將自己安置在關係日趨密切、互相有利的國際環境中，並在此環境中謀求出路。當時蔣廷黈眼見國際主義在增長，所以他要求國人壓低排外的情緒，以謀外交協調、經濟合作之利^⑯。

中國自1950年代以來，大體已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威脅：中國所急需的，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一個中外協合、互惠互利、共存共榮的國際主義。

中國自1950年代以來，大體已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威脅：中國所急需的，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一個中外協合、互惠互利、共存共榮的國際主義。

註釋

- ① 秦孝儀輯：《先總統蔣公嘉言總輯》(台北，民國56年)(三)，頁124。
- ②③ Herman Mast II & William G. Saywell著，吳德發譯：〈由傳統中崛起之革命——戴季陶的政治理念〉，李國祁等：《民族主義》(台北：民國70年2版)，頁416；頁442-43。
- ④⑥⑦ 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國》(台北：民國70年)，頁465；頁189；頁192。
- ⑤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台北：民國65年1月9版)，頁92-93。
- ⑧ 余英時：〈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與知識分子〉，同上引李國祁等著書，頁558。
- ⑨⑩ 鄒韜奮：〈發動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抗戰以來》，頁4；〈共赴國難的黨派團結〉，頁13-15。
- ⑪⑫⑬ 蔡淵潔：〈抗戰前國民黨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1928-1937)〉(民國80年7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頁65；頁122-27；頁287-305。
- ⑭ 徐鰲潤：〈戴傳賢對「民族國際」的推行與貢獻〉，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民國81年8月6-8日，台北。
- ⑮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台北：民國78年)，頁423-551，實業計劃，引文見序。
- ⑯ 黃德宗：〈蔣廷黈及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民國81年6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14、216、240、244。

張玉法 著名歷史學家。1975年起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85-91年任該所所長。1992年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述有《歷史學的新領域》、《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近代中國政治史論》及《中國現代史》等。